

1992年,南昌大学尚在孕育期,时任江西省省长的吴官正力邀出生在江西九江的潘际銮出任校长一职,并且派人“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关于这段故事,吴官正退休后曾写下《三请潘际銮》一文,收入他出版的《闲来笔谭》一书。

## 于弧光中绽放火花

■本报记者 郝俊

今年夏天,清华园曾迎来一批特殊的学员,他们是22名来自首钢总公司的一线“蓝领”焊接能手。暂别忙碌的工厂车间,身穿蓝色工装端坐在课桌前,大家难掩心中的兴奋与激动:“听说是个院士来讲课。”

当85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潘际銮面带微笑走上讲台,有人忍不住拿出手机急忙拍照,为眼前这位“焊接泰斗”留下属于自己的珍贵记忆。

“天天玩电焊,老师一讲才知道,里面的学问多着呢!”听完第一堂课,学员们纷纷慨叹自己似有醍醐灌顶之感。

火花四溅,弧光灼眼。常人印象中,焊接是个熟能生巧的纯技术活儿。而在潘际銮的世界里,焊接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并不像“揉面团”那么简单。

不仅如此,对于与焊接技术科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潘际銮而言,这门学问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肩头沉甸甸的责任,更意味着毕生无法割舍的夙愿。

### 焊接事业奠基人

“同学,请问焊接馆怎么走?”如约前往潘际銮的办公室采访,记者在绿树掩映、高楼林立的清华校园迷了路,只好向身边穿梭往来的学子求助。

“焊接馆?不知道。”“抱歉,我也不太清楚。”问路接二连三的失败,记者开始怀疑潘际銮提供的建筑名称是否为今天的同学们所熟悉。

“那你知道机械工程系怎么走吗?”记者想起来,潘际銮毕业后便留校任教于该系,“焊接馆”大抵在此。

“噢,往南直走大概200米,右手边有一栋老楼,那里应该就是。”

红砖木窗的苏联式建筑,楼门内一块黑色大理石上刻着“焊接馆”三字,金色的字体已褪色不少。办公室的门敞开着,四处整齐码放的书堆中,潘际銮正在伏案工作。

与潘际銮聊起问路之事,记者才知道,这个如今让年轻学子感到陌生的“焊接馆”,曾有着非同一般的身世。也正是这栋不起眼的老楼,见证了潘际銮伴随我国焊接事业所走过的每一步。

时光倒转至60年前的1953年9月14日。这一天的《新清华》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清华大学及中央高等教育部批准,增设了四个专业,即焊接及其设备专业、暖气通风专业、拖拉机专业、电子管制造专业。”

当时,清华大学尚未建立焊接教研组,只有一个附属在金属工艺学教研组内的焊接小组。第一批新生入学后,那些因仰慕大师风采而来的学生心中充满失落,认为焊接技术会埋没自己的才能,甚至满腹牢骚:“这玩意儿还要学五年?”

同样的疑问,也曾发生在潘际銮选择焊接作为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之时,只是他本人从未因此动摇过。

1950年,教育部决定从全国高校选拔150名优秀青年教师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俄语,为全面学习苏联、改革中国教育制度作准备,潘际銮入选。半年后,教育部又作出决定,将这批俄语进修生全部转为研究生,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深造并开展研究工作,为加速新中国工业发展进行人才储备。

在50多位苏联专家中,唯一获得过博士学位的教授、苏联知名焊接专家普罗霍洛夫引起了潘际銮的特别注意。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潘际銮曾聆听过一门“焊接学”课程,知道正在迅速发展中的焊接技术将在未来的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来我对焊接专业有印象,二来知道普罗霍洛夫是非常有名望的教授。”出于这两点考虑,潘际銮主动报名参加焊接专业,从此与焊接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不久,潘际銮收到一封女友来信,对他的专业选择感到些许担忧:“我对焊接技术了解不多,但我的朋友和周边的人笑话我说:你男朋友学焊接?学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干嘛?”

“当时国家的工业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像样的焊接工程,所以大家非常不理解。”潘际銮回忆,尽管亲朋好友对他的专业选择表示不解,但在普罗霍洛夫的指导下,他看到了一个“完全是高水平的科研领域”。

1953年,潘际銮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焊接中金属的晶间层断裂问题》,并于暑假回北京探亲期间,接受了清华大学委托主持筹建焊接专业和焊接教研室的任务。

两年后,28岁的潘际銮成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最年轻的教研部主任,主持新开设的焊接工艺及其设备专业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也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焊接专业和焊接教研组的建设者。同年,清华大学“焊接馆”正式落成投入使用。

面对质疑自己专业重要性的焊接学子,潘际銮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焊接是一门新兴的先进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标志。焊接能节省原材料,坚固美观,简化工序,并能改善劳动条件。世界上约有一半的钢材需要焊接才能成为可用的产品,一辆轿车约有7000个焊

点,一架飞机约有25万个焊点和250米焊缝,一个焊接的锅炉要比铆接的锅炉节省25%的金属。想一想,焊接是多么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啊!”

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焊接人才的同时,潘际銮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科研事业高峰。在1958年到1966年这短短的8年中,他率领焊接教研组,结合我国工业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研究突破了重型轧钢机架的电渣焊技术、大型锤锻堆焊技术,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真空电子束焊机,完成了2500吨水压机全套高压蓄热器、清华大学核反应堆焊接工程、我国第一个汽轮机大型拼焊转子等工程任务。

技术封锁、资料匮乏、条件艰苦,潘际銮必须完成“落后条件下的自主创新”,他说自己的想法只有一个:“我要为国家的工业建设服务。国家有需要,我就要想办法去解决。”

### 沉甸甸的“可靠”二字

“国家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焊接工程师。”潘际銮用这句话勉励过无数学子。然而在每一项恢宏壮观的工程项目中,人们很少对那些手持焊枪的工人予以特别的关注,隐藏其间的高端焊接技术更是鲜为人知。

核电站的安全性问题举世瞩目,可是鲜有人意识到,在高温、高压、高辐射等极端条件下保证它安全运行四十年,不允许发生丝毫泄漏,正是焊接技术为此立下的汗马功劳。

“核电站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结构,其制造、安装、维修要保证百分之百的可靠,如何做?就得靠焊接。”潘际銮说,随着工业水平的发展,对焊接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其研究的科学内容也因此越来越复杂。

1987年,我国第一座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施工进入关键时期,核工业部请外国专家前来参观指导,他们发现工程中有大量焊接结构质量不合格,对此十分担忧。

随后,潘际銮受命前往秦山核电站实地考察。他在安全壳及核岛内多处发现大量焊接裂纹和质量问题,决定向施工单位建议立即停止工程,有问题的焊接结构推倒重做,并重新制定焊接结构、性能及工艺试验方案。

“如果因为焊接问题导致核电站出现安全事故,那将产生极为惨痛的损失。”在潘际銮看来,焊接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工艺和技术问题,每

一项工程都在提出极富挑战的科学问题。

在潘际銮的建议指导下,秦山核电站的施工建设在极为严格的质量管理下完成,1991年正式发电运转,迄今为止,主要焊接结构从未发生过问题。

在潘际銮60多年的焊接事业中,他所参与完成的工程项目不胜枚举。而要问他对自己的哪一项工作最满意,他的回答则是:“说不好是哪一项,但让我最满意的是,中国的很多重大工程我都曾参与。”

2005年,我国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京津高铁开工建设。工程关键之一,是以焊接方法制造无缝线路,而焊接质量成为保证铁路安全、高速行驶的关键。

全长120公里的铁路由两根平行、中间没有任何缝隙的钢轨组成,焊接接头达到3600余个。这一重任,落在年近八旬的潘际銮的肩头。

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潘际銮与课题组同事一次次亲临现场考察,掌握一手资料,发现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短短两年时间,他领衔的“京津高速线钢轨闪光对焊及热处理工艺的研究”课题组为项目建设提供了6份研究报告。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京津高速铁路开通,参加车辆运行的潘际銮坐在车厢里,脚下“天衣无缝”的钢轨上,是自己检验把关的3000多个焊接接头。

“你们指导人家做的这项工作,是不是可靠?”这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很多人,特别是高技术工程如核电工程、高超超临界煤电工程、高铁建设中,最常向潘际銮提的一个问题。

“我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凭什么来回答呢?”潘际銮说,他只有踏踏实实进行科学试验,给出切切实实的科学证据,解决工程中的科学

问题,才敢给出答案,“要用科学方法证明这么做是可靠的,我才能建议这样做。”

“要知道,我说过‘可靠’二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有如医生为疑难杂症确诊一般,潘际銮口中的“可靠”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诊断书,需要担负巨大的责任,“一旦出事,那将造成重大损失”。

### 校长做科研的“秘诀”

“作为技术科学领域的专家,必须为我国的经济和工程建设服务,去做国家最需要的工作。”走过半个多世纪,潘际銮始终秉持这样的原则。

事实上,即便是在潘际銮担任南昌大学校长的10年间,他也从未停下为工程建设服务的一线科研工作。

1992年,南昌大学尚在孕育期,时任江西省省长的吴官正力邀出生在江西九江的潘际銮出任校长一职,并且派人“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关于这段故事,吴官正退休后曾写下《三请潘际銮》一文,收入他出版的《闲来笔谭》一书。

最初,因未能及时得到潘际銮本人的答复,江西省有关领导曾向他表示:为了不过多影响您的学术活动和健康,哪怕您去挂个校长的名,具体事务可以少做或不做什么。

“要么不去,要去就得有名有实。”潘际銮素来不做有名无实的事,这不是他的工作作风和为人习惯。

1993年4月,65岁的潘际銮接受邀请举家南迁,出任南昌大学首任校长。对于自己即将履行的职责,他明确表态“不具体管人事、财务、组织”,重点抓教学质量和科研工作,其他事情皆

委托给其他有能力的副校长负责办理,但由党政联席会议集体讨论确定。这样既没有太多的事务负担,又能掌握学校的大政方针。“不具体管人事、财务,你当什么校长啊。”潘际銮的做法引来诸多议论,甚至有人说他“有点傻”。

“我的目标,就是把学校建好,最大的心思就是在教学和科研上。”同时,潘际銮也不放弃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做行政官员可以不干业务,但作为大学校长,如果不作教学研究,我也不大赞同。因为这样会脱离实际,不利于领导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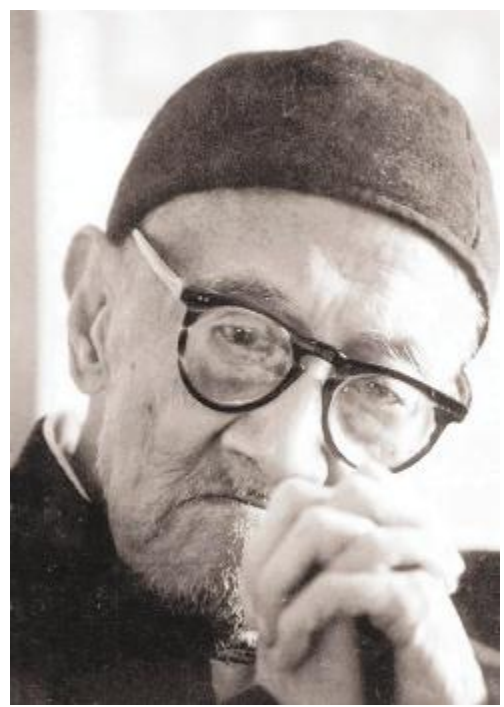
担任南昌大学校长的十年间,潘际銮坚持进行研究工作。他继续在清华大学和南昌大学两校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南昌大学还培养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建立了研究室,进行“爬行式弧焊机器人的研究”,其中一项成果经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获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并获中国和美国专利。

1997年,他在病床上完成了专著《现代弧焊控制》的写作,该书在我国出版后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国外出版社主动要求购买英译本版权。此后,他又亲自完成了该书的英文版翻译工作,在英国出版。

“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不追求名利,也不谋求权力,只追求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作贡献,完成任务,获得成就感。”

2002年,潘际銮从南昌大学校长的岗位上卸任,他没有去安享晚年,而是回到了清华园继续忙碌。转眼又是十多年,这位总是行色匆匆出入“焊接馆”,骑着电动自行车穿梭往来的耄耋老人,已然成为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还没有停下来去休息的想法。”潘际銮希望自己再多干几年,为中国的重大工程再多解决一些问题。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2013年10月18日,梁漱溟诞辰120周年。借此时机,多部梁漱溟作品再版,而围绕梁漱溟其人其事,其思想的纪念研讨活动也相继在全国各地举办。

出席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纪念活动时,梁漱溟的长子,89岁高龄的梁培宽感慨,他父亲就像一个“出土文物”。

学者、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梁漱溟被外界冠以诸多称号,经年累月,却不断有人这样发问: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

10月20日,“这个世界会好吗?——纪念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诞辰12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梁漱溟嫡孙梁钦宁同台对话,以各自不同的视角解读梁漱溟。

### “我一生都是拼命干的”

上世纪70年代,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的艾恺开始研究梁漱溟,其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



“我信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好是任听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对。因此,我全无悲观。”

## 重识梁漱溟

■本报记者 郝俊

化的两难》于1979年在美国出版,成为海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梁漱溟的著作。艾恺也由此被誉为“梁漱溟研究第一人”。

研讨会上,首先发言的艾恺站起身,在讲台前来回踱步。他用流利的汉语表示:“作为历史学家,我想稍微修正一下自己原来对梁漱溟先生的‘鉴定’。”

几十年来,艾恺在向人们介绍梁漱溟时,习惯为他冠以“哲学家”的头衔。“不过现在,我认为更应该强调其‘活动家’的一面。”艾恺说,梁漱溟有点像印度历史上的甘地。

艾恺给出了自己作此更改的缘故。1980年夏,已经研究了近十年梁漱溟的艾恺,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已是87岁高龄的梁漱溟。艾恺回忆,头一次访问,梁漱溟就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去实行、实践的人。”

正是这番话,让艾恺开始重新认识眼前这个复杂的研究对象。此后两人的接触中,梁漱溟曾多次跟艾恺说,自己没有资格当一个学者,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唯一的嗜好只是思考问题。

1987年11月,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一场梁漱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梁漱溟曾拍着桌子大声说:“我不单纯是一个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投身社会活动,以他积极践行乡村建设为标志。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实验研究院,很快成为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领袖。此后七年间,他先后在邹平成立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农场、医院、图书馆、社会调查部和师范学校,还曾组建农民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然而,梁漱溟在邹平的“乡建实验”,最终随着

抗战的爆发而偃旗息鼓。

“梁漱溟到农村去搞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建设新中国的最初实践。”许章润说,直至今日,经过疾风暴雨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中国乡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还需要回到乡村,回到中国文化的根。

### “我全无悲观”

“这个世界会好吗?”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投湖自尽前曾如此问道。而这一问,多年后也成了“梁漱溟之问”。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在为两个问题寻找答案: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

“今天,但凡梁漱溟所思考的问题、所为之焦虑而奔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许章润看来,自1840年以来,中国核心的历史主流意志和主流问题所围绕的根本之处,不外乎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

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许章润认为,重温梁漱溟的精神遗产“依然是一座绕不过去的桥”;而关于人生,人们常说立德、立功、立言构成三不朽,“梁漱溟则尤其以立德构成三不朽之核心”,梁漱溟家人讲述的一段故事,也许能为其道德人生作出注释。

“文革”结束后,梁钦宁曾问过祖父梁漱溟:“红卫兵抄家,您生气吗?”“不生气。”老人只回答了简简单单三个字。

“为什么?”梁钦宁说,他感到有些奇怪,当即追问祖父。“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梁漱溟答道。

许章润认为,梁漱溟一生以佛家的态度对待自己,而以儒家出世的态度对待社会,“儒佛一体的心智和心性,为今天中国之所缺,可能也是千古绝唱”。

1917年,24岁的梁漱溟正式前往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第一天,他便当着陈独秀的面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很突然,犹豫一阵后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则可以讨论。

“我不仅仅是个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四年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在他心里,儒佛本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

艾恺在著作中将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亦曾引起诸多争议。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代表就曾多次提出:“如果梁漱溟算最后一位儒家,那我算什么?”

“英文中的The Last,是引发强烈情感的词汇,带有浪漫意味。”艾恺解释说,将其翻译为“最后的”,事实上消除了这层感情色彩。除此,“The Last”在英文中的另一个意思是“最近的”、“上一次的”,作如此理解,便能避免误会。

然而无论如何,艾恺都认定,梁漱溟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儒家所要求的思想道德的外化。

许章润则认为,艾恺将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并不为过。他甚至说,今天讲儒家的很多人是“吃儒家饭的”,并不是真儒家。

1988年,梁漱溟的人生大幕落下。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需要休息。”

梁漱溟一生之人格追求,受其父梁济影响很深。对于父亲“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一终极之问,梁漱溟其实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我信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好是任听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对。因此,我全无悲观。”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最后,梁漱溟用这段话给出了答案,他相信未来的世界会好,并不对人生感到悲观。